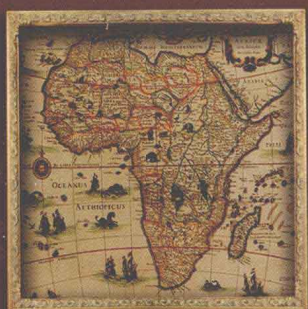




传统与现代

非洲文化与政治变迁

李保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传统与现代

非洲文化与政治变迁

李保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与现代:非洲文化与政治变迁/李保平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301-11440-7

I. ①传… II. ①李… III. ①传统文化-影响-政治-研究-非洲
IV. ①G14 ②D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8977号

书 名: 传统与现代:非洲文化与政治变迁

著作责任者: 李保平 著

责任编辑: 徐少燕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1440-7/D·296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4.25印张 401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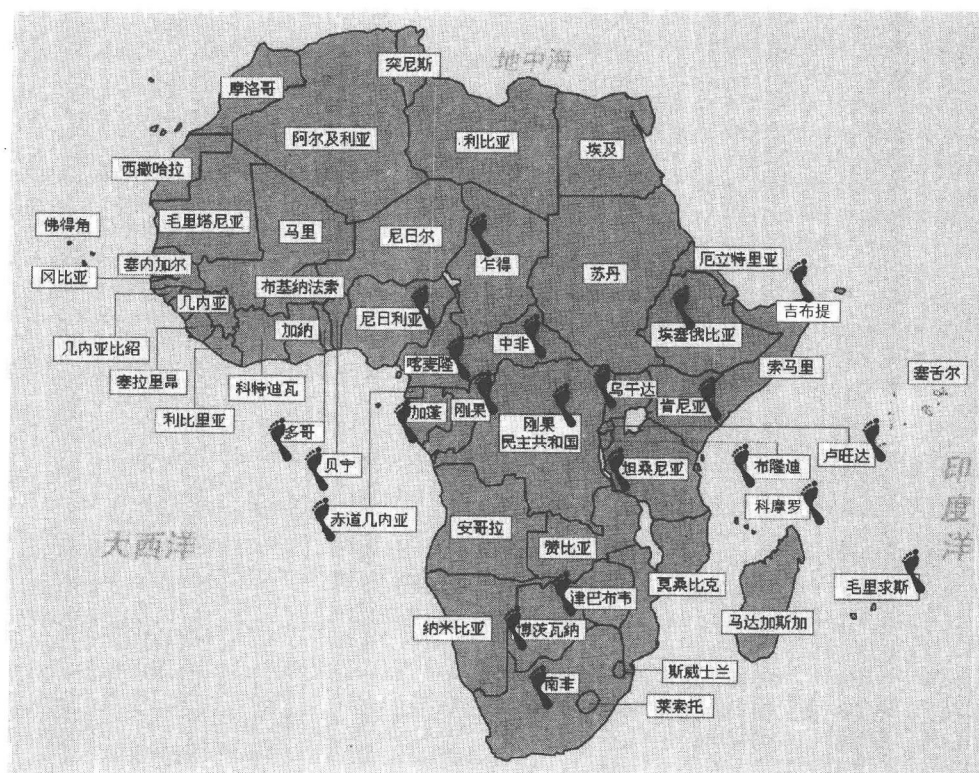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作者在非洲的足迹

序 言

李保平教授关于非洲文化与政治的专著遗稿,经刘海方博士整理,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让人宽慰的事,也是中国非洲问题研究的一项重要新的进展。

我应保平的夫人徐勤霞老师嘱托为本书写序,曾经十分犹豫。我对非洲研究是外行,本不应越俎代庖。但我同保平有二十多年亦师亦友的不断交往,如果他还在世,多半也会要我为他的新书写一点东西。念及于此,就在小序中先忆人,后议书,告慰在天的保平仁弟。

初识保平是在1986年,当年我在北大国际政治系第一次开设硕士生课程“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保平来听课。比起同班的其他同学,他显得更加老成、认真,还带着一点羞涩。虽然我虚长保平十岁,但两人相熟之后,发现共同语言很多。私下交谈时说起过,我们俩都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期吃不饱肚子,不过当时我是少年,他是婴儿。好在都没有因为吃不饱而过分影响发育(当时三聚氰胺奶粉和瘦肉精等还没有问世,食品的“量”重于“质”)。两人的性格也有一点相似之处,都属于偏内向、偏保守的慢性子,相信做工作、写文章需要“慢工出细活”。我们俩都属于重家庭的男人,而且喜欢贴近大自然的生活。记得保平当年住在北京西郊某处时,说他和夫人、幼子常常在周末到湖边泛舟、野餐,邀请我们一家三口同去享受野趣。可惜这项动议没有得到落实。

第一次真正跟保平在学问上打交道,是他同徐昕、郝望两位同班同学合作翻译汉斯·摩根索的名著《国家间政治》,让我担任校对。平心而论,四个译校者都很认真,又各有特色,其中最认真的当属保平。徐昕的译文最让我放心,改动最少;郝望的翻译需要仔细一点校读,因为他碰见难点,偶尔会滑过去,我得核对原文,补充漏掉的部分;保平则正好相反:他会去添加译注,还会在译文中增加原文没有的内容,比如某个事件发生的年代、地点等等,生怕让读者漏掉点什么,弄得我又气又爱,只好替他忍痛割爱,删掉原文中

没有的词句，必要时把添加的词句改为译注。

2005年春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回北大，保平几乎是头一个来找我谈学术工作的老师，讲他和徐昕、郝望重新翻译了摩根索那本书的第七版和新版原文增加的内容，嘱我再写一篇序言。这本厚重的国际政治学经典著作的中文版，凝聚了一般读者难以体会到的大量心血。这是保平对国际政治学科建设的一个值得记下的贡献。

保平的专业方向是非洲政治，但是他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广泛兴趣，显然促进了他的非洲研究。至少，他是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同世界政治的大局联系起来的，并且努力以政治学为基础。这一点，在潘维学友回忆保平的文章中有所提及。我个人经历的事情是：保平从徐勤霞老师那里听说我要给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安排的新闻界研讨班讲课，内容涉及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就主动要求旁听，课后还要私下垂询几个问题。这样的情况，在我记忆中至少有三次，虽然我并不知道我的讲座内容是否对他有所帮助。

保平的好学态度和广阔视野，在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从非洲传统文化的角度切入，准确地抓住了非洲政治的核心特点。他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部族文化、口传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特征，表明黑非洲社会文明发展尚处于较初级的阶段，与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工业文化、精英文化、文字文化、信息文化有较大差距，使黑非洲各国独立后的政治发展处于较低的起点上，在试图建立类似现代西方社会那样较为先进的政治制度时，势必遇到极大的阻力。在独立初期仿效宗主国设计的政治体制，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和经济基础，最终都未能经得住冲击而坍塌。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建民主政体的努力也同样面临严峻的考验。

书中论谈到，黑非洲历史文化传统诸要素中，以对部落（或称部族）的片面政治认同和忠诚为核心的部落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共同政治文化的诞生和国家、民族一体化的形成，是导致政治不稳定、政治发展滞后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强烈的部族色彩反映了黑非洲政党和领导人的不成熟性。它往往使多党竞争变成不同部族之间的较量，使竞选活动演变为部族冲突。更有甚者，一些国家境内的部族要求独立，建立主权国家。在冷战后苏联、南斯拉夫等国家出现裂变以及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独立的示范作用下，一些部族要求分离和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不仅会危及一国的统一和稳定，而且也对当初非洲统一组织确定的殖民时期边界不可改变的原则提出了挑战。黑非洲文化心理中的保守特性，尊崇祖先、以年龄而不是

以才干取人的思维定势,动辄求神、祭祖、看“风水”之类的愚昧风习,使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政治文化难以与之对接,从而不利于新政治体制的移植。当今黑非洲政坛上朝令夕改、以言代法的弊端,可以从口传文化的短暂性中找到思想根源。

初步了解了黑非洲的文化传统之后,对这一广袤地区的政治制度为何多变,一些国家政局为何不稳,就容易理解了。通过制宪的和平手段或者流血的军事手段,独立初期实行多党制的非洲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改行一党制或禁党制。至80年代末,在非洲当时51个独立国家中,只有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实行多党竞争的政治制度。

作者认为,与多党议会民主制相比,一党制、禁党制的权威型政府更容易克服国家分裂的脆弱局面,有助于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国家生存发展的巨大压力,迫使非洲国家倚重国家权力来加快民族整合。国家政权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控制和干预,各种形式的“非洲社会主义”风行一时。被视为采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另一些国家,也出现了政府官僚机构的膨胀和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当时的非洲领导人普遍认为,多党议会民主制不适合于非洲,而一党制则符合非洲传统社会的“民主”特性;由领导人民取得独立的政党上台执政,是历史的必然。执政党对其他政党予以解散或取缔,对不肯就范的反对派力量进行打压,使其处于地下状态或流亡国外。政府控制着国民经济生活的所有关键部门,国营企业占据了工矿企业的主体,同时也是强化集权统治的重要工具。

作者指出,从当代非洲由传统村社社会这一低起点迅速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背景上看,这种局面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并且逐步充分暴露出来。尼日利亚、刚果(金)等国家走上了军事政变、军人政权的道路。军事政变与合法的、合乎程序的政权变更相比缺乏合法性,是对政治文明的一种反动;军人政权与文官政权相比,受到的约束和制衡力量更小,因此具有更强的随意性,更容易滥用权力。统治者借助武力和压制而不是民主、协商和法治的方式进行管理和统治。不少军政权领导人成为军事独裁者,其国家政治走向专制、腐败。在中非、乌干达、布隆迪等国家,军政权的专横暴虐让民众生灵涂炭,国家蒙受耻辱。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党或禁党的政治体制受到严峻的挑战。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的政治剧变,导致部分采取苏联模式的非洲国家的执政党陷入迷惘和危机。作者谈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强势与政治经济霸权,使得相当一部分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盲目信奉普选、多数决的合法性。西方的

现代化图景更给非洲国家带来巨大的诱惑力，提高了民众的期望值，从而给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一浪潮到来之时，非洲国家毫无例外地被裹挟进民主化的旋涡之中。书中写道：“这个世界简直容不得非洲国家按部就班、从容不迫地进行政治制度的设计，推进政治发展的步骤和现代化行程；它们只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引入民主政治，从而出现了‘勉强的民主’的尴尬局面。”保平在这部著作中，相当详细地解剖了他长期观察、几次亲身访问的坦桑尼亚的政治发展，指出冷战结束后非洲面临西方要求实现民主化的巨大压力，而坦桑尼亚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80%来自西方。为了获得经济发展必需的援助，坦桑尼亚政府只能面对现实，按照西方援助国的要求启动多党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其结果是党争导致联合政府的权威和施政能力受到削弱，给统一民族的构建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从整体上看，保平在本书中对黑非洲各国走西方民主化道路的批判，比起对源于本土的前现代统治方式的批判，要严厉、深刻得多，虽然正如他所指出的，两者都阻碍了黑非洲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进步。根据我拜读本书和平时同保平谈话时的理解，他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视为衡量非洲政治的首要价值。显然，西方民主化对这些目标的冲击是巨大的。那么，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才能更好地促进非洲国家建立现代政治文明、法治和发达的经济，同时又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完整呢？除了西方对非洲的外部压力和部分受到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盲目追随西方价值以外，非洲有没有实现法治和民主的内在动力和因素呢？

作为非洲研究的外行，我很希望从保平那里请教更多的问题，得到更多的答案。本来，他生前最后一个阶段在非洲的深入考察和积累的大量资料，会使他的思考更为深邃成熟。然斯人已逝，伤悼追怀之余，惟有从保平的遗著中汲取学养，实现他的遗愿，把我们对非洲、对整个发展中世界的政治和文化的研究，把我们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研究，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王缉思

2011年盛夏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代自序

传统文化与黑非洲政治发展^{*}

在当今发展中世界中,黑非洲不仅是经济上最贫穷的地区,而且也是政治发展较为落后、政权体制脆弱、政局动荡多变的地区。黑非洲政治发展落后的原因很多,文化传统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对黑非洲的政治发展起着很大的阻滞作用。

一、传统文化的特征与政治发展起点

千百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族黑人创造了丰富博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些传统文化在 16—20 世纪因西方殖民扩张而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其基本内容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大部分地区留存下来。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新生的非洲国家着手对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改造,然而,这些文化传统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显示着自身的存在。笔者将黑非洲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三个方面,即部落文化、口传文化和大众文化。这些特征表明了独立时期黑非洲的政治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均起始于较低的起点上。

(1) 部落文化。黑非洲传统社会的结构,是以一定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部落为基本单位的。至今黑非洲远离都市的广大农村地区,仍保持着传统的社会结构体制,部落色彩十分浓重。由于相对不利的自然地理条件、酷热的气候以及撒哈拉

* 本文曾发表于《亚非研究》第 5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原文标题为《黑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沙漠和热带雨林阻隔形成的封闭环境等种种原因,黑非洲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长期以来,黑非洲社会未能积聚起足够强大的力量摧毁部落制度的基础,使部落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

(2) 口传文化。黑非洲各族大多迟至 19 世纪仍未创造出本族文字。语言是传统社会传播信息和分享文化主要的或唯一的媒介。历史上只有少数几种语言有相应的文字,其流布区域十分有限,不足以改变黑非洲文化整体上的非文字特征和口传特征。传统文化的遗产主要是由人们口耳相传、口授心记而保留和继承下来的。

(3) 大众文化。传统的黑非洲文化以大众为主要载体,黑非洲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十分丰富和发达,体现了黑非洲文化广泛的大众参与特性。相形之下,黑非洲精英文化要逊色得多。由于在部落制度下,很少有人能够从事专门的和复杂的脑力劳动,黑非洲历史上鲜有哲人、思想家出现,不像西方有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中国有孔孟老庄。我们很难读到非洲黑人在历史上写就的政治理论著作或其他领域的学说和著作。在精英文化匮乏的情况下,老人作为智者的作用尤为突出。谚语则是黑非洲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经验和智慧、人生信念和准则的另一重要来源。

以上概略地列举了非洲传统文化的三项主要特征。^① 从“硬件”即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上来看,这些特征表明黑非洲社会文明发展尚处于较初级的阶段,与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工业文化、信息文化有较大差距。从“软件”即精神文化的角度看,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伦理、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也都与现代文明有较大的差距。由于起始于部落制度和部落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文化基础薄弱,公民文化素质偏低;由于传统文化中缺乏现代工业文化、文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特质,黑非洲独立后的政治发展处于较低的起点上。它在试图建立类似现代西方社会那样较为先进的政治制度时,势必遇到极大的阻力。它在独立初期仿效宗主国设计的政治体制,由于建筑在这样不相称的基础之上而危机四伏,最终都未经得住冲击而坍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重建民主政体的努力也同样面临严峻的考验。

^① 对黑人文化特征的分析,详见李保平:《论黑非洲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 6 期,第 100—108 页。

二、部落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制约

黑非洲历史文化传统诸要素中,以对部落或部族的片面政治认同和忠诚为核心的部落政治文化是十分突出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共同政治文化的诞生和民族一体化的形成,是导致政治不稳定、阻碍政治发展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因素。

笔者在第一部分中分析的是非洲黑人文化的共性。由于同属热带民族,共处于因撒哈拉大沙漠和赤道雨林等屏障阻隔而形成的相对封闭的人文环境中,非洲黑人各族的传统文化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我们从这个角度将黑非洲视为一个文化整体。另一方面,黑非洲文化又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和多样性。部落社会相互封闭、隔离的状态,使黑人各族在各自的地域里形成了各自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讲,黑非洲文化的共同特征之一便是它的差异性。黑非洲也有一些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国家组织,并开始了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过程,这种变革使社会具有了某种封建统一的形式,但是终因缺乏强大的经济力量摧毁部落制度的基础,所以仍不能在较广的疆域内融合成一个具有统一语言和统一文化的民族。随着西方殖民者在黑非洲的扩张和殖民统治的确立,在城市、沿海地区和富矿地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得到成长和发展。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殖民当局往往竭力拉拢扶植当地传统势力,并维持甚至强化传统的社会文化和宗教习俗。殖民者采取“分而治之”的做法,加剧了部族间的隔阂和矛盾。因此,西方殖民者未能在其统治疆域内打破旧有的部落政治文化,实行民族一体化。旧有的众多部落集团各自为政的局面基本上保留了下来。

20世纪60年代以来黑非洲各殖民地相继赢得政治独立,形成了几十个新生的主权国家。这与欧亚等地的国家形成的情况很不同。欧洲、亚洲的多数国家的情况是,由社会—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而形成统一民族,然后在与民族所在地域大体一致的范围内建立国家。黑非洲则是在宣布建国之后才将民族一体化提上日程。各国缺乏强劲有力的主流政治文化来凝聚各族人民的意志,境内林林总总的部族缺乏统一的政治文化,国家观念十分淡薄。

同一部落或部族的人们怀有强烈的集团意识,强调对本部落本部族的认同与忠诚。这种部落政治文化被称做部族主义,它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它倾向于排斥其他部族,将对国家的忠诚与认同置于次要地位。它不利于统一的国家意识的形成和共同政治文化体系的构建,对新生国家起着极大的侵蚀作用。部落主义像血液流经肌体一样,几乎无所不在地渗

透于非洲政治生活中,妨碍着黑非洲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

黑非洲的政党及领导人往往有部族背景。某一政党的社会基础往往只是某一个部族,并且不少政党的领导者或骨干本身就是部落酋长。因此许多政党或政党领导人都得到某一部族的支持,并充当部族利益的代言人。独立前的黑非洲政党及领袖人物就有不少带有部族的烙印,比如尼日利亚的情况就是如此。尼日利亚独立前划分为北区、东区和西区三大行政区。北区中豪萨—富拉尼族人口占据优势,“北方人民大会党”(后来任总理的巴勒瓦是该党副主席)就是以该部族为社会基础。西区人口以约鲁巴族为主,以阿沃洛瓦为首的“行动派”则代表该部族的利益。“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成立较早,在伊博族政治家阿齐克韦的领导下,比较注意联合其他政党,开展争取独立的斗争,成为唯一在全国有影响的党;但在新党派成立后,豪萨—富拉尼族和约鲁巴族成员纷纷退出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该党原有的全国性基础遭到严重削弱,其支持者主要限于东区的伊博族。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多党制风潮中,许多国家的部落政治文化在政治舞台上充分显示出来。带有部族色彩的政党纷纷登场亮相,有的国家甚至有多少部族就有多少政党。在扎伊尔,出现了274个政党,分别代表国内250多个部族。刚果出现了40多个政党,其中大部分政党及候选人都有部族背景。

强烈的部族色彩反映了黑非洲政党和领导人的不成熟性。它往往使多党竞争变成不同部族之间的较量,使竞选活动演变为部族冲突。为了赢得选举,参加竞选活动的政党和政客往往竭力动员本族人员参加投票并鼓动部族情绪,极易造成部族不和与政局动荡,“尼日利亚政党史,在更大程度上讲就是在三大地区占主要地位的部族间的争斗史”^①。再如,1991年3月,在肯尼亚总统竞选活动中莫伊总统所属的卡伦金族和反对派人士所属的卢奥族之间多次发生冲突,数百人死于非命。

部族主义赋予非洲政党的不成熟性还表现在某些政党及其领导人制定的政策上,很难想象有强烈部族色彩的政党或政治家能够提出形成全国共识的政治目标 and 政治口号,克服新生国家内严重的文化差异和部族不和。事实上,由于一些政党和领导人采取了错误的部族政策,不仅无法完成民族整合和社会凝聚的任务,反而恶化了部族关系,扩大了文化鸿沟,某些政党

^① Robert S. Jordan, *Government and Power in West Africa*, Benin: Ethiop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8, p. 134.

或军人政府上台后,执政者在处理部族关系时往往采取厚此薄彼的做法,任人唯“族”,将本族人安插在政府、军队中任要职,在资金、物资调拨和国民收入分配等问题上向本族所在地倾斜;在重要部门排斥其他部族的人,在经济待遇上也对其他部族实行歧视性政策。乌干达在奥博特和阿明执政期间均是如此。奥博特政权带有强烈的部族主义情绪,强调本族利益。在军队中扶植属于本族的兰戈人,利用军政大权欺压其他部族。阿明取代奥博特后,调整军队的部族构成,建立起以努比族系为依托的军事独裁体系,对阿乔利族和兰戈族政府官员进行残酷的迫害和杀戮。1980年奥博特再度执政后,建立了兰戈人、阿利乔人和特索人的联盟,反对所谓的敌人——布干达人和巴尼杨科莱人,造成社会分裂。在利比里亚,1980年多伊发动政变上台后,建立了克兰族的部族统治,同样也采取歧视和压迫其他部族的政策,使国家和人民饱尝苦难。

一些当政的部族欺压其他部族,而被压迫部族则不甘于被压迫、被统治,采取各种形式与之斗争。新的部族上台后,对原来的部族进行报复。部族间的矛盾和敌视酿成部族仇杀,这在上文提及的乌干达、利比里亚是如此,在卢旺达、布隆迪等国家也很突出。

总之,由于许多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受制于部族主义,因而难以担负起团结各族人民、长期有效地治国安邦的重任。在大多数国家里,独立时众多的部族集团时至今日仍未整合为新兴的统一民族,在许多国家,部族对立和分离的倾向加剧了,部族主义加上国内国际其他因素的制约,使当今黑非洲各国重建民族国家统一文化困难重重,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的任务显得格外繁重和艰巨。

更有甚者,一些国家境内的部族要求独立,建立主权国家。在苏联解体、前南斯拉夫国界变更以及厄立特里亚独立的示范下,一些部族,如马里、尼日尔境内的图阿雷格族,要求分离和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不仅会危及一国的统一和稳定,而且也对非洲统一组织确定的殖民时期边界不可改变的原则提出了挑战。

三、传统文化对政治发展的综合影响

黑非洲传统文化对其政治发展的制约是多方面的。除了部落政治文化带来的深重影响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方面的制约。

(一) 部落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保守性

长期以来,黑非洲社会未能积聚起足够的力量打破部落文化的稳定性,

一个个部落留存下来,得到巩固,并不断地复制和再生。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历经数千年仍改变无多,势必产生更为扩散和久远的影响。黑非洲社会发展的停滞性和部落共同体的稳定性赋予黑人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文化心态上的稳定和保守的特性。人们往往遵奉祖先的传统、先人的伦理准则行事。

部落文化具有的落后和保守的特性还突出地表现在宗教和巫术中。在部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不发展的情况下,人们只好求助于虚构的超自然力量来预测、化解或控制各种力量带来的重重威胁。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鬼魂崇拜等原始宗教流布于黑非洲各部落,巫术中的各种仪式、器具和咒语以及人们对巫术的痴信也都反映出传统文化执著、原始和神秘的一面。

在精英文化稀缺的情况下,传统社会中老人享有很高的地位。他们是文化遗产和古老风尚的传人,亲手建立和培育起社会的组织原则、调控方式和生产方式,并依靠长者的权威将传统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传承给年青一代。在缺少精英文化、崇拜经验、尊重传统的社会中,他们被视为智者、学识渊博者而备受敬重。老人的突出作用也反映出黑非洲传统文化保守的一面。

黑非洲文化中政治体制和文化心理上的稳定性和保守的特性,以年龄而不是以才干取人、崇尚传统、尊敬祖先的思维定势、动辄求神、祭祖、看“风水”之类的愚昧风习,使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政治文化难以与之对接,不利于新政治体制的移植。许多黑非洲国家引进社会主义模式或多党民主模式尝试的失败,与黑非洲文化的保守性是有一定联系的。

(二) 口传文化的示范性与行政低效

在许多黑非洲国家,国家政权脆弱不堪,官僚机构无能,行政效率低下,政策号召得不到响应,不能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这既与部落政治文化带来的认同危机有关,也与口传文化中的一些弱点有关。

由于在传统的黑非洲社会中,感情的沟通、知识的传授、社会调控、行政管理等都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通过口头语言进行的,天长日久势必引起相应的文化摄取。口传文化的示范性和经验性历经岁月冲刷而在人们心理上积淀下来,使重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有人情味的直接交往形成一种心理定势,成为黑人各族稳定的心理文化特征。有的学者认为,口传文化带给黑非洲各族的这种文化心理特征使民众视当今官僚的书面行政管理手段为

异体,人们无法认同与接受政府的文牍主义管理方式和决策信息。这种管理手段与文化心理的矛盾,是导致当今黑非洲许多国家行政低效的重要文化原因。^①

口传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语言分化严重,不易趋同整合。黑非洲有独立语言七百多种,这也给黑非洲行政管理带来不便。比如总统视察农村体察下情,本是接近百姓、弥补文字管理不足之举,但与自己的国民交谈往往要借助译员才能进行,影响了与大众的沟通和行政管理效能。可见,单纯的口传文化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

由于黑非洲各族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缺乏现代沟通的封闭环境中,人们的时间、效率观念比较淡薄,并往往缺乏深谋远虑,这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贯彻都带来很大困难。

(三) 口传文化的短暂性与法制建设

黑非洲传统社会一向要求每一位讲述人忠实地复述他们目击的事实和从前辈那里听来的知识,以使口头传说经年历久不被歪曲,保证口头文化的准确性。黑非洲保留下来大量有价值的口头传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最直接和最丰富的史料来源。这充分反映了黑非洲人民的非凡记忆力。尽管如此,在口耳相传中,由于口误或记忆疏漏,以及传述中的取舍和剪裁、阐释和说明、想象和引申,难免会出现讹误,这使黑非洲文化具有变异性和短暂性的特点。当今黑非洲政坛上朝令夕改,以言代法的弊端可以于此找到文化根源。

(四) 传统文化与妇女的地位

对妇女的歧视、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也是黑非洲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消极方面。妇女成为完全平等的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各个领域的生活和决策,是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一夫多妻制、男尊女卑的观念在广大的黑非洲地区仍十分流行。

在传统社会里,男子通过多娶妻子而获得较多的劳动力,进而获得更多的财富,男子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因而提高。时至今日,一夫多妻制这一古旧习俗仍然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婚姻形式。在这种婚姻制度下,妇女是男人的附属物,她们要操持家务、侍奉丈夫、养育孩子,要照管庄稼或牲口,肩负

^① 刘鸿武:《论黑非文化特征与黑非文化史研究》,《世界历史》1993年第1期,第91页。

着沉重的体力劳动负担,而对土地和牧畜大多无所有权,对出售作物的收入也无支配权。妇女获得贷款、化肥、农药、技术服务的机会都远远少于男子。许多妇女在求生存、教育、保健方面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更谈不上在分享权力和决策方面与男子的平等了。据统计,非洲国家是政府官员和议会议员中妇女人数最少的地区。

(五) 生育观念与人口控制

还有一些文化因素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尽管不是直接的,但并非不重要。比如黑人社会关于生死繁衍的观念,不利于对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在大部分非洲人社会里,人们都把人丁兴旺视为富有的重要标志,把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看得高于一切,视之为他们的生命力得以在尘世间永远延续的条件。这种生育观念使黑非洲的人口控制十分困难,而在资源匮乏、生活穷困的情况下,人口的片面增长只能导致人均生活水平的停滞或下降,人口各方面的素质难以提高。无疑这对黑非洲包括政治发展在内的社会发展进步是十分不利的。

文化传统是一条河流,人们永远不能割断它。政治家们在设计非洲政治发展的宏图时,以及学者们在考察和预期黑非洲政治发展进程时,都不能忽略传统的历史文化的巨大作用。完全将传统政治文化弃之不顾,盲目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幻想一步到位地进入某一理想的政治发展阶段,是不现实的和难以成功的。

实际上,黑非洲传统文化对政治发展并不是只有消极影响,在许多方面是有可取之处的。在 20 世纪上半叶,欧美的非裔黑人精英分子发掘和肯定非洲黑人传统文化独具的价值,促成了光大“黑人精神”的黑人文化复兴运动和泛非主义运动,为唤醒非洲黑人的自我意识、推动非洲联合作出了贡献,为非洲现代民族独立运动奠定了基础。这种肯定黑人文化的精华、促进非洲团结与合作的“黑人精神”即使在今天也未失去其意义。

目 录

第一章 非洲传统文化研究	1
第一节 非洲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1
第二节 非洲传统文化的基本形式:口传文化	14
第三节 非洲谚语及其蕴含的文化传统	27
第四节 非洲神话的类型和功能探析	40
第五节 黑人祖先崇拜仪式及其作用	51
第二章 从传统走向现代:非洲政治变迁	59
第一节 非洲国家政治体制的嬗变	59
第二节 独立前政体的变迁(尼日利亚个案)	127
第三节 传统文化在政治发展中的成功运用(喀麦隆个案)	137
第三章 现代政治变迁案例一:坦桑尼亚	152
第一节 非洲贤人——开国总统尼雷尔	152
第二节 坦桑尼亚民主化研究	166
第三节 变迁中的外交哲学与实践	224
第四章 现代政治变迁案例二:南非	238
第一节 白人种族统治的存在与解体	238
第二节 南非问题与国际社会	296
第三节 过渡时期的种族力量博弈	302
第四节 新政权面临的诸多挑战	331
第五节 南非现代政治变革及其意义	356
后 记	367